

江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四輯



江 津 县 政 协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编

《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目 录

在党的统战政策指引下

——江津和平解放纪实……………谢 直 (1)

在川东特委江津财经小组工作情况……………熊伯涛 (9)

江津的接管……………刘表兴 (15)

江津被服厂解放前夕的斗争片断……………吴膺里 (22)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汇集南京

请愿情况纪实……………卞稚珊 (29)

冯玉祥将军在白沙二三事……………程智铭 (51)

聂荣臻同志在江津中学……………江津县聂帅文物征集办公室整理 胡昭 执笔 (57)

漆鲁鱼同志的一生……………邹绪良 (73)

一位坚强的女战士

——记刘钦瑜 (李往) 同志……………邢象超 (77)

程德音事略……………马 骞 (86)

刘季刚生平简介……………刘子华 (88)

聂庆云传略……………油溪镇志编写小组 (92)

黑石山与白屋诗人……………周开庆 (96)

国际生物学家李先闻博士……………龚灿 滨 (104)

佛学大师欧阳竟无……………曾桂良 (107)

江津财政史略……………郭建中 (112)

浅谈清中叶后江津人民的繁重税负……………古基祥 (117)

白沙“五·六”抢米事件见闻……………罗树乾 (125)

四川创建的第一家私营银行

——江津晋丰银行……………陈泽华 (128)

李市场的牛市.....陈仲书石夫 (131)

红苕传入江津初考.....田廷枢 (137)

江津师范学校的历史回顾.....龚孟坚 (139)

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在江津.....邓云烟 (145)

江津时化中学创办经过.....赵铭彝 (150)

江津县城街道沿革.....涂贻谋 (154)

江津团防局琐谈.....刘晓甦 (158)

0 军阀混战时期江津的土匪和赌博.....杨锡龄 (165)

江津县气象测候工作今昔.....江 防 (171)

江津县棋艺史话.....李恩琪 (174)

简介白沙镇的三副古联.....杨 眉 (181)

龙门险滩记.....龙门乡志编写小组 (183)

补白：戊午元旦试笔.....吴芳吉 (14)

白沙大瀑布.....胡小石 (28)

忆昔驴溪水.....(女) 吴练青 (50)

萝登峨眉绝顶诗.....(清) 王家驹 (91)

晚出西射堂.....(清) 赖汝弼 (95)

为白沙黑石山风景区大门撰联二付

其一：.....王利器撰 周浩然书 (103)

其二：.....邓少琴撰并书 (103)

将自永宁归家先此寄内.....吴芳吉 (106)

江津气象之最(之一).....江津县气象站范征文 (144)

江津县气象之最(之二).....范征文 (164)

江津县气象之最(之三).....范征文 (170)

江津县气象之最(之四).....范征文 (180)

春日即事.....(清) 王家驹 (185)

江津气象之最(之五).....范征文 (185)

江 津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第 四 辑

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津县白沙印刷厂印刷

定价 :38.00元

在党的统战政策指引下

——江津和平解放纪实

谢 直

一、写在前 面

我出生在江津县金刚沱乡，七岁时就离开老家和父母，随伯父（原川军将领）一起，在军营里过生活。童年时代，受到“黄花岗上草青青，赤血洗尽中华魂。民族、民权与民生，三民主义革命军”歌声的感染，树立了长大后要从戎报国的思想。因此，在十五岁那年，我就投入川军的“军官教育团”学习。毕业后，又迷信正统，先后进入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和工兵专门学校学习。以后，长期在国民党的工兵部队、军事机关和陈诚系统的军队工作。解放前夕，我任国民党军366师师长，驻防江津。照常理推断，以我的家庭出身，以我所受的教育和我年轻时候就风云际会的经历来看，当解放军进军江津，威胁重庆时，不成问题我会坚决抵抗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当解放军一来，我即行撤退。这不仅使江津免除了一场战祸；而且还为解放全川让出了一条通道。我采取了这一对人民有利的正确的行动，不是偶然的，是在党的统战工作长期指引下的结果。

二、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统战工作 对我的教育和影响

一九三四年，我到南京投考中央军校，住在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家里，认识了吕超的弟弟吕一峰，他当时是左派人

物，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他经常讲一些苏联的情况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给我听，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可以救中国的；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的说法，使我视听一新，对事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抗战初期，我在成都一四九师当参谋，激于民族义愤，不愿在后方过安定的生活，抱着“纵令身膏草野，可以无恨黄墟”的决心，请缨杀敌。经历了淞沪、南京战役。一九三八年在西安任独立工兵第三团少校连长，常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接触，受到很大影响。在担任架设泾、渭、洛三河的载重桥梁工程时，更常和从延安来的同志一道乘车去西安，大家都具有战友般的热情。特别是在泾河架桥时，曾幸福地受到朱总司令亲切的接见和嘉勉，使我内心里排除了当时有些人对共产党的恶意宣传。

一九三九年，我调回重庆，在军政部军务司要塞科工作。我一个堂兄谢微进，璧山人，地下党员，他的爱人是匈牙利人，妇产科医生，也是共产党人。他们在我伯父住宅（临江门大井巷八号）附近韦家院坝开设一妇产科诊所，掩护革命工作。这时，我正住在伯父家，和他们夫妇经常接触，他们向我灌输了不少革命的道理，在我思想上种下了寻找真理的根苗，我也有时为他们开展革命工作起了一些掩护作用。

抗战胜利时，我在兵役部任职，复员回南京后，我意识到时局将日趋复杂，便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初和兵役部国民兵司司长肖作霖同时申请停役，在南京办《大道报》。这时，重庆《新华日报》准备迁到南京出刊，我的另一个堂兄谢重开，是谢微进的胞弟，负责将该报印刷所迁到南京。但由于反动派的阻挠，报未办成，而印刷设备有被反动派“吃

掉”的危险。谢乃将印刷设备和一部份工作人员转给《大道报》，组成《大道报》印刷所，由谢重开任主任。这不仅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党的财产和工作人员的作用；还在谢重开和其他同志的熏陶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他和国民党之争，决不是权利之争。

《大道报》因受排挤而停刊，我不得已重新回到军界。到重庆第七编练司令部（司令罗广文）任第一处少将处长兼各军、师驻渝联合办事处处长。这时，内战帷幕已经正式拉开，我内心本来是反对内战的，但我在彷徨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回到为国民党编练二线军队的行列。因此，我的思想常在矛盾、斗争、苦闷和不安之中。

一九四八年夏，刘伯承司令员派罗广文的同乡、日本士官同学刘永庆同志到重庆向罗广文策反，由我引见。罗不敢接受，又不便拒绝，嘱咐我好好接待。我把刘接到办事处热情招待，后又护送他离渝。他告诉我很多党的政策，特别是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起义政策，使我产生了在必要时也参加起义的念头。但我又考虑到，党的政策是允许民族资本家存在的，与其作为一个官僚随军起义，不如还是从事商业，向经济方面发展为好。于是，我和友人接办了重庆安康银行，自任董事长，打算在解放以后经商算了。直到我任366师师长后，在解放军强大威力和党的统战政策影响下，我又认识到：如果我以这一部份军事力量俟机投向人民，这就是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党和政府无论在什么时候，一定不会忘记我的，这才是自己最好的出路。于是我放弃了经商的打算，逐步结束了安康银行的业务，准备在关键时刻率部起义。

三、江津和平解放

南京、武汉、上海等地相继解放后，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蒋介石梦想凭借四川险要的地形和丰富的人力、物力、财力负隅顽抗，等待所谓国际形势的变化，以便卷土重来。便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偕同蒋经国、黄少谷、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曹圣芬和特务头子毛人凤等，由广州飞到重庆。下机后，发表谈话，大意是：四川要重新担负起反侵略、反共产的任务。望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持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云云。一时人心浮动，惶惶不安。当解放大军向西南进军，十一月十四日蒋介石又由台湾飞抵重庆坐镇，为其残兵败将加油打气。吹嘘现在国军还有胡宗南的五十多万人，宋希濂的三十多万人，罗广文的二十多万人，总共有一百多万人，战斗力是十分强大的，西南万无一失，希望全体军民，消除悲观情绪，树立必胜信心，为保卫大西南而战斗到底。于是西南地区战云密布，到处都是刀光剑影，弄得鸡犬不宁，闾里骚然。同时，蒋介石为了扩充兵力，保卫西南，命令西南长官公署迅速成立了三个独立师，番号为364师、366师、367师，分别以陈宏谟、胡国泽、谢直、艾绍珩充任师长。并以366师驻防江津，江津地居重庆上游，为其右臂，属于重要战略地区。

同月十六日，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临时官邸召见新成立的三个独立师师长陈宏谟、艾绍珩和我（见重庆《商务日报》报导），这次是一反常态，用的是个别接见的形式。在接见我时，要我坐在他的左侧，假惺惺地做出很关怀的样子，问我的家庭情况，生活有无困难。我答，我是江津人，有老家可以依靠，生活上没有困难。只是新编的部队，武器

被服装备尚缺，请校长飭令联勤总部早日发下。蒋生气地叫侍从秘书打电话给联勤总司令陈良迅即拨发。最后勉励我说，你驻防家乡江津，是适当的。江津地处重庆侧翼，一定要严密防守，认真执行长官公署的命令，确保重庆安全。召见后，由顾祝同、蒋经国陪同我们共进晚餐。第二天，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钱大钧、副长官兼参谋长肖毅肃、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孙伯权又召见我具体布置任务。大意是，共军进军大西南，战况紧急，你们虽是新编尚未经过训练的部队。但也要列入预备队，就地备战。同时还强调，江津地处重庆侧翼，是确保白市驿机场和成渝公路不受威胁重要地区，要我立即返防，在胡宗南第一师未到达江津北岸布防以前，务必阻敌于南岸，但不是死守孤城，背水一战，而是要尽量拖住敌人，确保重庆不受威胁。并布置三项具体任务：①拆除江津民房，构筑野战防御工事，必要时将第七编练司令部拨给我师做基干部队的学兵团使用上去；②待胡宗南的部队到达北岸布防完毕后，366师即可随长官公署行动，在撤离江津时，务将江津南岸上下一带所有木船全部驱往北岸烧毁，以阻止解放军由江津渡江，截断我军后路；③转移时，将西门外联勤总部的被服厂烧毁。我当时虚与委蛇，表面上接受，思想上却另有打算，认为蒋家王朝坏事做绝，民心丧尽，彻底复灭的日子已经不远，我何必逆天行事，为其殉葬，自己应当机立断，投向革命，才是唯一的光明前途。所以，第二天我并没有遵照命令返回江津，而是一面积极利用蒋介石的许诺，向西南补给区司令部洽领武器、装备；一面请叔父谢公权向党联系，请求党迅即派人去江津指导我师起义。同时，命令由第七编练司令部拨给我师作为基干的学兵团急行

军由璧山移驻成渝公路上的要冲丁家坳，集结待命，准备在必要时截断成渝公路；又将我师所辖的1096团唐卓然团调驻白市驿镇，与拜把兄弟367师师长艾绍珩约定，在必要时同其驻守在北市驿机场的一个团（艾师由空军警备旅改编，故仍担任守机场的任务），共同封锁机场，截断航空线。一切布置妥当后，我向后勤部门要了一条专轮，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装上补充的武器弹药和其装备，带着全家老小，回到了江津366师师部。我原想以驻军的地位，县人的名义，促进地方机关法团一道起义，以尽我保家乡，保亲人的义务。不料二十六日，二野三兵团联络部的朱炳辉同志，化装成老百姓，由我叔父谢公权陪同起早由重庆经白市驿到达江津。我立即安排他住在我借住的杨赞卿家的客房里，和我父亲谢衡浦同房，以掩人耳目，直到夜深人静才和他秘密接谈。他取出我在青年时代就敬佩的吕一峰同志的亲笔信，传达党对我决心起义表示欢迎，但为了好争取罗广文兵团同时起义，以彻底瓦解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尽快解放全川，要求我366师不必在江津起义，可撤到长江北岸，掩护解放军渡江，然后跟在国民党军的殿后部队撤退，而在解放大军的先头前进。这样，可以避免其他部队与解放军接触发生战斗，然后我逐步靠拢罗广文兵团，策动罗广文起义。于是，我放弃了在江津策动各机关法团共同起义的计划，按照党的指示，重新作出如下安排：

①召见江津县长翁话邇、公安局长姚某，向他们传达了西南长官公署要我们固守江津的命令。要他们服从军事指挥，认真维护地方治安，搞好军需民食的供应工作。

②会晤了联勤总部所属江津被服厂厂长赵松涛，转告了

长官公署的决定。赵告知我，已接到联勤总部下达的必要时配合驻军将被服厂彻底破坏的命令。他流露出非常惋惜的心情。我和赵曾在工兵学校共过事，所以也坦率地对他讲，你惋惜的是你主管的厂房和设备的毁坏，我是江津人，我不能不考虑家乡父老的生命财产。表示非万不得已时，不执行这一命令。最后，请他严格掌握他的警卫部队，一切听从驻军命令。

③向和我私谊较深的本师参谋长李天侠、团长唐卓然和学兵团副团长李复初（团长由我自兼）、军械科长刘静涵等透露我和党已经取得联系，规定与解放军遭遇时，不准开火。

④在江津南门外虚张声势，布置少数兵力，设立前敌指挥所，架设电话专线，并用此专线不断和长官公署参谋处长孙伯权联系，以应付上级。

⑤商请朱炳辉同志化装成我师情报参谋，携带军用证书和我师电台密码呼号，对着解放军进军沿线前去，与解放军接头，随时用密码向我联系。约定解放军到达江津后，不要攻城，待胡宗部第一师到达北岸布防后，我师即撤到北岸，暗中将所有渡船放回，运解放军渡江，我师进行掩护。然后，即向罗广文兵团靠拢，执行党的下一步计划。

⑥为了向党表示我起义的决心，将和我一起生活的妻子儿女交由父亲带回金刚沱老家，不与我随军同行，争取早期解放。

这时，解放大军已突破宋希濂部，罗广文兵团在南川东的白马设防，由于所属崔伯川团阵前起义，两军措手不及，惶惶逃遁到重庆南温泉一带。我意识到解放大军即将经綦江到达江津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胡宗南所部第一师已抵江津北岸，并通知我师已布防完毕。重庆警备总司令杨森和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孙伯权均先后电话通知我师立即炸毁被服厂，撤到北岸，烧毁所有能供解放军渡江的船只，然后沿成渝公路随长官公署警卫团之后，向川西方向集结。这时，江津县长翁话圃、公安局长姚某均已弃职逃走，我为确保江津县城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命令我师警卫营在各街道设置岗哨，以防宵小之徒，乘机抢劫和捣乱；同时，命令驻在城内的师属部队，迅速撤到北岸的双龙乡待命，并将所征用的船只一律放回南岸，不得毁损。当解放军尖刀排已到江津东郊时，我一面亲率部份警卫部队在大街小巷徒步巡视，安定民心，一面飭令戒严部队，立即撤离，迅速渡江向驻在双龙乡的师直属部队靠拢。一直到天黑，在没有人发觉的情况下，我才和随身警卫及有关人员坐上仅为我留下的两只小木船，渡江去双龙乡师部。解放军即时和平进入江津县城，在渡过长江时，曾遭到胡宗南部小股溃军的抵抗，敌军终不能支，遂向成都方向逃窜。我才按原定计划，率领全师，沿着成渝公路缓缓前进，去执行党交给我的任务的最后一部份。

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江津和平解放的真实情况。

江津的和平解放，使江津父老避免了一场战祸，少受很多损失，也为解放重庆、奠定四川起了积极的作用，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这是党的统战政策的胜利，我们应当衷心感激党和政府。事情已经过去三十五年了，但我每一想到，心情还是激动不已。现在，社会主义祖国正如日方升，光芒万丈，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下，认真搞好各项统战工作，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新的贡献。

在川东特委江津财经小组工作情况

熊 伯 涛

我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到江津的，当时川东地下党组织决定在江津建立川东特委财经小组。在社会关系上，主要是通过阮曙曦，他是谢石钧的亲戚，当时任江津田粮处科长。财经小组组长由谢石钧担任，成员有我和李雪波（后来彭水县革委会副主任）。由阮曙曦出资黄谷壹百市石搞棉布花纱生意，门面上搞的烟店，叫裕民商店，以阮曙曦作经理，我当营业，谢石钧作会计，位置在小什字老银行旁边（今新街子工业局门市右角）。我们开烟店，做生意，一方面是为了挣活动经费，另一方面，也作为川东特委领导人的联络点。川东特委邓兆铭、肖泽宽、李培根、李治平都到江津来开过会，住在阮曙曦家，有时也到裕民商店来。

我们财经小组由川东特委直接领导，对地方党组织的活动，起初没有介入。后来，我们也搞了些工作。如统战工作，对社会上层活动进行调查了解，同时在城内也发展了党组织。

江津地下党组织，那时有南岸工委和北岸工委，是肖泽宽搞起来的。后来，张岚星从铜梁撤下来，肖泽宽叫他们到江津来，与南岸北岸工委联系。到了四、五月份，战局发展很快，我解放军已渡过长江，形势很好。当时，上级党委指示，解放西南主要靠解放军部队，地方上搞武装暴动打击敌

人，已不是主要的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迎接解放，准备怎样接管好。同时决定，财经工作不再发展，确定我参加县里党组织活动，作南岸工委组织委员，书记是刁光明，宣传委员是黄国平。

在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空运三个师布置在重庆至朱沱长江北岸沿线，阻止我军渡江，同时，在各县组织反共保民军，江津由青年党的廖海涛任军长，他在当地拥有实力。国民党反动派的中统特务组织，以国民党的县党部和县府特委会为活动中心，特委会名义上属伪县府领导，其实是独立的，开支要地方拿，县长是挂个名的主任，实际由秘书负责，秘书叫丁灿麒。一个乡还有个党网通讯员，除由乡长挂名外，还有搞具体工作的。另外有个民社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旗帜下，也积极活动，幸天民是民社党的重要成员之一。

我们按照党的指示，那一段时间，一方面了解敌人的活动情况；一方面开展宣传。宣传解放全中国的大好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腐朽、堕落及其必然垮台的命运。号召人民保护国家财产和重要文件资料，使国民党的机关、学校、工厂能完好地保存下来，以便接管。我们还抓紧作统战工作，通过阮曙曦对一些在当地有影响的人士做思想工作，他先对各区田粮专职主任作了思想安定工作，并在田粮处工作人员中讲：“解放军来了，我们这些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使那些人都各安其位。在社会上，我党的《约法八章》传开了，刁学鸿就在茶馆里说：“《约法八章》胜过雄师百万”。影响是很大的。幸天民也转变了态度替我们作宣传，我们也给任应秋、王仲昌他们作了工作。争取他们为迎接解放作贡

献。从整个的情况看，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县城的秩序基本上稳定下来，没有出现混乱的局面。

江津被服厂是国民党军队在西南最大的被服厂，厂长是赵松涛。原来，厂里没有我们的人。后来，重庆方面介绍了一个进步群众，叫吴鹏里，是安徽人。吴从小就在厂里做童工，后在厂里消费合作社当小职员，与重庆的党组织有联系。我们财经小组就去与他接头，他很热情，我们也把他当党员同志一样对待。后来通过审查，把他吸收入党。我们给他的任务是弄清厂里情况，密切联系群众，稳定情绪，注意保护厂里的财物，不要让敌人破坏和弄走。他表面上像不问政治的一样，在群众中说：“我们这些小职员，解放军来了，反正也是那么回事。”厂长准备炸厂，又埋黄金、白银，我们都弄得一清二楚。与我们有联系的，还有厂会计主任陈秉宏（广东人）、还有卢慧英（女、原来是党员，掉了关系）。由于我们预先有安排，解放时，党员一出来，群众拥护，把敌人也孤立了。

江津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解放的。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李培根同志来布置工作，迎接解放。他说：“解放军部队已到彭水，按路程计算，大约还要三、五天才能到江津，地下党与解放军接头的口号是‘红英’”。二十六日，我便出发到南岸去传达，当天到了刁光明处。二十七日，原准备到柏林、蔡家去传达，我还没有走到蔡家，就见到宋希濂的部队溃退下来了。我看不容易通过，就从龙吟折回，到了夹滩，就看见好多部队，有的拄着棍子。到了城里，已是七点，刚回到家正准备吃饭，一会儿阮曙曦来了。说他院子背后的部队戴着五角金星的帽子，可能是解放军来了。我以

为没那么快，正在怀疑，就听见武城那边响了几声枪声。同时，店里的人也来说解放军进城了，我饭都没有吃，就与谢石钧、李培根、阮曙曦一路进城，阮曙曦到小什字和王仲昌联系慰劳解放军；李培根到东门与一〇八团接头；我与谢石钧、李雪波连夜去接管田粮处、银行、工厂（主要是被服厂）、国民党县府（那里跑得一个人都没有了）。我们把机关贴了封条，并封存了银行金库。我与谢石钧到了被服厂，工人也来了。我们把几百两黄金、几百块银元，连同原料，都贴上了封条，一直干到次晨三点钟。李培根又主持开会，商讨成立什么组织，以便于接管及对外事宜，最后决定成立“江津县行政委员会”，李培根作主任，谢石钧与我作付主任，阮曙曦、王仲昌、周化成为委员，杨近愚管民政，幸天民管总务，阮曙曦管财政，曹泽芝管公安。阮曙曦叫蔡科去刻了一颗“江津县人民政府”的方印，以便开展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行政委员会成立，各阶层人士都来了，有的来献计，有的来表态，有的来交枪枝子弹。市场第二天就恢复正常秩序。登记了反动党团骨干。我们叫阮曙曦家的几个长工背着枪来警卫县政府。

解放军进入江津后，休息了两天，未住民房，在街檐下住着，战士们一天跑两百多里路，疲倦极了。

当时胡宗南的部队摆在北岸一线，反动派溃逃时，把大船小船全部都弄到北岸去了。我们问部队怎样渡江，部队同志答复，他们自有安排。二十九日晚上渡江之前，给我们打了招呼，说要打仗了。船是怎样来的呢？原来，我们的先头部队在两天前就化装成宋希濂的部队，找伪政府领了钱粮，过了江，然后再把船弄过来，当天晚上，，前锋部队已过去了，

我们看见打了照明弹，整个部队过去了，我军被打沉了一支船。第二天，过江部队在两路口一带与胡宗南部展开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打了一天，才停止了枪声。

十二月九日，我同李培根、谢石钧到重庆把西南服务团接来，在十三日（或十五日）正式成立了江津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委书记卢云亭、县长赵一川。

解放初期，我们还狠抓支前工作，那时刘伯承司令员对江津很重视，他说江津城关有三万多人，可以建立市。西南军政委员会派来了粮食工作组，调粮食支援重庆。曹泽芝那时在油溪发现停有国民党五支运粮的船，装有几千石米，她派人把船扣下，进城来请示怎么处理，我们就把那五支船交到重庆，解决了重庆粮食暂时的困难。接着在征粮中，阮曙曦叫田粮处第二科科长聂鸣福代处长职务，召回各区征收主任，弄清原征收数字，冻存征存粮谷，废止伪拨单，把田粮处整个机构原封接管下来。他熟悉情况，哪里有粮哪里无粮他都清楚，全县交了两亿多斤粮食支前，他出了很大的力。

解放后不久，反动势力不甘心灭亡，组织土匪暴动。朱沱的暴动发生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一日，是全川最早的。那时，四区（石蟆）区长李成文带领工作队到朱沱点的大河、九层等四个乡征粮，正逢场天，同志们都分散下乡征粮去了，恰值土匪暴动，就有八位同志光荣牺牲。其中有县委派下去的张洪宝、粮食局的李相廷股长，还有军大梁伟柱等六位同志。第二天我带了县大队一个连的兵力到朱沱剿匪，土匪有三、四百人，伪乡长樊建德就是通匪的。我们在那里住了七、八天，土匪多达千人以上来围住我们，可是，大部份是被胁迫的群众，我们把机枪一打，都吓跑了。